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YANG MINZU DAXUE GUOJIA SHIYIWU 211GONGCHENG JIANGSEXIANGMU



村寨人口与文化

——中国人类人口学的田野实践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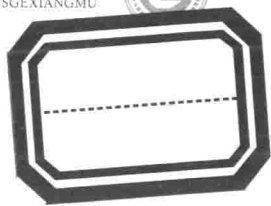
CUNZHAI RENKOU YU WENHUA

Zhongguo Renleirenkouxue de Tianye Shijian yu Tansuo

◎ 陈长平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YANG MINZU DAXUE GUOJIA SHIYIWU 211GONGCHENG JIANSHEXIANGMU



村寨人口与文化

——中国人类人口学的田野实践与探索

CUNZHAI RENKOU YU WENHUA

Zhongguo Renleirenkouxue de Tianye Shijian yu Tansuo

◎ 陈长平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寨人口与文化——中国人类人口学的田野实践与探索/
陈长平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660-0102-3

I. ①村… II. ①陈… III. ①少数民族—农村人口—
研究—中国 IV. ①C924.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4864 号

村寨人口与文化——中国人类人口学的田野实践与探索

主 编 陈长平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8.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102-3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圣敏

委 员： 丁 宏 戴成萍 王铭铭 王建民

包智明 潘 蛟 苏发祥 任国英

杨筑慧 肖小勇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

总 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 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我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

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联系 actual 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
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目 录

导 论	人类学的人口研究	陈长平 (1)
-----	----------------	---------

第一编 人口与生育

第一篇	社会结构与人口发展	
	——基于侗族村寨占里的研究	沈 洁 (41)
第二篇	中国人口控制的奇葩	
	——贵州占里村经济与人口六百年保持和谐的原因探析	敖 曼 (137)
第三篇	生育与生存	
	——一个高山苗寨的男孩偏好研究	李金花 (181)
第四篇	数字背后的故事	
	——M 村生育观念转变的人类学考察 ...	董迎军 (265)

第二编 婚姻、家庭与养老

第五篇	婚姻、家庭和人口的自我调适	
	——以贵州一个侗族村寨为例	陈伟斌 (311)
第六篇	“反哺”的危机与重塑	
	——基于一个侗寨的家庭养老考察	赵耀文 (357)
第七篇	农村如何养老	
	——以山东省 L 村为个案的养老模式研究	张 喆 (435)

第三编 人口迁移与流动

第八篇 劳动力流动对侗族家庭及其社区的影响

——以贵州省从江县银良村为例

..... 杨 菲 (517)

后 记 陈长平 (571)

导论：人类学的人口研究

陈长平

人口学 (demography) 是研究历史上各个社会阶段人口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这种研究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狭义的人口学只从数量角度研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过程, 又称为形式人口学 (formal demography); 广义的人口学不仅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并重, 而且注意到人口与社会、经济、民族等其他方面的联系, 又称为人口科学 (population science)^①。本文所述的人口学是指广义的人口学。

人类学在美国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四个分支。本文所说的人类学, 主要是指社会文化人类学。欧洲大陆的民族学 (ethnology), 与英美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大体相似, 文中不再区分。

一、人类学研究人口的意义

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人口具有特别的意义。^②

(一) 加深对族群 (ethnic group) 的认识

学术视野中的族群人口数量、质量及其变化, 在相当程度上

① 参见向洪等主编:《人口科学大辞典》,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49页。

② 陈长平:《民族学中的人口研究》,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9年第1期, 第27-28页。

标志着该族群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不得不将人数保持在一定水平，人口太少无法维持其自我繁衍；人口太多则会出现食源失衡，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和族群衰落。现代社会也十分重视族际过程研究，利用人口指标，如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职业行业构成、文盲率等等，可以加深我们对这类族群本质的理解，例如该族群在社会发展过程所处的地位，从而寻求其未来发展的策略。

（二）深入了解人口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人口是各种文化现象的载体。人口变动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如中国大陆的一代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却有众多的叔舅姑姨。这使他们在亲属关系、人际交往和社会心态等许多方面都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研究人口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区域生命历程的认识。这方面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研究，探讨人口变化与社会演进的关系；另一类是微观研究，如死亡率或生育率改变对后代亲属关系的作用，人口变动对遗产、地位和继承制度的影响等。

（三）促进人类学中的定量研究

文化人类学对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关注有限。这固然是受学科传统的影响，也有对研究对象自身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判定问题。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时适当使用人口统计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可以促进人类学中的定量研究，使科学实证与人文诠释各得其所。

（四）在某些方面促进人口学的发展

狭义的人口学（demography）一贯强调对普遍因果模式（universal causal models）的探索和标准化的人口调查方法的应用，而社会文化人类学则注重族群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口学内部形成了对自身能力的不满，部分地冲淡了人们对该学科主导范式的信心。这种不满最显著地表现为一些持续不

断的呼声，要求把人类学的洞察力结合到人口过程的研究中来。因为一些重要的研究发现，文化构成（cultural setting）独立于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着生育率下降的启动和蔓延。

最响亮的呼声来自于澳大利亚人口学家杰克·考德威尔（Jack Caldwell）。他在对西非的村落进行考察并研修了一些英国人类学专著之后，从传统的人口学家变成了学科内部的学科批评者。他写道：

“多数人口学家研究大范围的数据，常常对这些统计数据所描述的群体不予理会。幸运的是，在 1962 年早些时候，我得知 1960 年加纳人口普查数据要出来得晚些，从而将耽误我的时间。于是我们用有限的经费进行了破费不多的调查，这意味着借用人类学的方法，逐一了解每个村落和其中的家庭。作为由传统学科培训造就的人口学家，这次的经历真令我获益甚丰！丰厚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有意识地使用类似的方法。”^①

后来他在与人口学家阿兰·黑尔合著的文章中又感叹道：“人口学研究存在着惊人的理论缺陷。”他把这种缺陷归结为人口学家们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对问题的可测量性的迷恋，即不愿接受那些无法用数字来表述其成果的研究方法。这种调查结果只局限在收集到的统计数据范围之内，而且数据本身也有问题。因为存在“得到标准反应的倾向，或者说找到规律的企图，尤其是涉及到敏感话题的时候。”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他们号召人们接受人类学的方法。世界人口大会人类人口学会（Committee on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的成立，标志着该运动取得了正式的、长

① Caldwell, John 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足的进展。^①

人口统计资料的信度是人口学家极为关心的问题。人类学家以其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长期的调查实践，常能发现数字的虚实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庄孔韶博士在福建某县调查时发现，县计生委 1986 年少统计出生人口 1170 人，漏报率高达 19.07%。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限制生育的愿望同农人家业发展本身就有矛盾。故罚款未能限制生育，为了躲避超生的惩罚便隐瞒出生人口。”^②

人口遗传学研究的困难之一，就是很难找到流动少与外界交往不多的小规模群体，即所谓的封闭人口（closed population）。而人类学中这样的例子颇不鲜见。如亚马逊河腹地的土著，南太平洋某些小岛的居民。^③ 对这些群体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口发展的某些规律。如近亲婚配对后代的影响，遗传疾病的发病规律等。

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人口需要综合运用人类学和人口学的原理与方法。这种取长补短的研究，必将在理论、方法上乃至体系上，极大地促进两门学科的发展。

二、人类学与民族学中的人口研究

（一）西方人类学中的人口研究

西方开始研究人口很早，若从 J·格兰特（John Graunt, 1620 - 1674）的《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算起，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即使从马尔萨斯（T. L. Malthus, 1766 - 1833）

① Caldwell, John C., Allan G. Hill and Valerio H. Hull, eds., *Micro Approaches Demographic Research*.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② 庄英章、潘英海合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 年，第 182 - 83 页。

③ Fix, A. G. *Anthropological Genetics of Small Popu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9. 8: 208.

的《人口原理》算起，也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这些研究大都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人类学一则产生较晚，二则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也与人口学有很大区别。“就研究方法来说，人口学与人类学原先也有很大不同；前者侧重量的分析，而后者则注重质的分析。”^① 早期人类学家不注重人口统计的分析方法有以下几个原因：1. 人类学家（特别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人口与作为人口学家研究对象的人口相当不同，因此人口学的一些定量分析方法不适合侧重理解和解释的文化研究。2. 他们怀疑人口学家采集的统计资料的可信度。3. 他们“畏惧”数理人口统计学，认为这需要很强的数学背景。

在人类学发展初期，人们对人口学有过短暂的兴趣，那是试图发现是否有人找到了长寿之道。这些有关长寿的神话，连同对苏联和南美安第恩（Andean）地区的调查报告一起被保留下来。人类学家对我们祖先的寿命也感到好奇，于是对死亡史和死亡者骨骼的研究也曾风行一时。至于生命周期的另一端，相当一部分努力都花费在出生性别比以及出生季节性本质的研究上。^②

历史表明，英国人类学家从本源上显露出比美国同行对人口学有更大的兴趣。与此相似，早期人口学家也坚定地倾向于经典的传统英国社会人类学范围内的田野调查。英国田野调查的传统强调社会结构和亲属关系甚于文化重构方法，而后者更具美国人类学特色。这种强调重点将它导向把亲属和家庭嵌入人口过程的人口学探索。与此同时，人口学中的文化概念从具有法理和规则

① 周云：《人类学对人口研究的启示》，载《人口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 19 页。

② Baker, P. t. & Sanders, W. T. Demographic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2. 1: 151.

倾向的英国结构人类学当代理论发展中引进了所有的文化涵义。^①

英国学者卡尔·桑德斯 (A·M·Carr - Saunders) 为了论证适度人口理论, 考察了历史上的各类民族。他认为无论是史前民族 (指无文字的民族) 还是有史以来的民族, 都有一个与环境 and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适宜人口 (optimum population), 倘若超过或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社会文化机制就会通过自身的调节, 使之趋向于这一数字。他特别指出原始民族并非漫无节制地增加人口, 他们也有自己调节人口的方法, 如戒绝性交、堕胎、杀婴、遗弃老人或病人等。^②

在人类学与人口学发展初期, 今天的学科界线尚未明确划分, 人类学家常在他们的工作中从事人口学的研究。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被反复引用的不列颠人类学田野调查指导《笔记与询问》(Notes and Queries in Anthropology), 把人口普查作为田野调查的初始步骤之一, 这些初始工作建构的框架是所有其他社会研究的基础。

在马林诺斯基将人口调查应用于特罗布里恩德岛之前, 拉德克利夫 - 布朗已在田野工作中使用了人口调查技术。他的经典之作《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③ 有相当篇幅用于人口方面。书中提供了各个岛屿的基本人口估计, 其中包括对 1901 年印度人口普查的批评。他不断追踪各岛屿的人口下降, 讨论由欧洲传入的种种疾病对提高死亡率所起的作用以及生育率的下降。此外, 人口下降的社会影响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① David I. Kertzer and Tom Fricke 1997.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In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toward a new synthesis*, ed. David I. Kertzer and Tom Fricke, 7 - 8.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英] 亚·莫·卡尔 - 桑德斯著, 宁嘉风译:《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第 132—50 页, 第 227 页。

③ Radcliffe - Brown, A. R. 1964. *The Andaman Islanders*. Glencoe, New York: Free Press. 该民族志的草稿完成于 1908 - 1909 年, 但直到 1922 年才出版。

雷蒙德·弗斯 (Raymond Firth) 是马林诺斯基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在他对波利尼西亚提科皮亚岛 (Tikopia)^① 的经典研究中，有一整章用于“现代人口问题”。这是弗斯的兴趣由亲属关系自身到经济组织转变的一个信号。人口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在小岛上人口和土地需要保持平衡。弗斯批评了早期欧洲人提供的提科皮亚岛人口数据的缺陷，并指出欧洲人的到来对先前支撑人口-土地平衡的文化机制造成了不良影响。基督教传教士出于民族中心主义而反对流产和杀婴这一传统人口调节机制。

虽然在人类学文献中一向包括人口资料，如人口总数、户规模、男女性别比等，但一些人类学家对此却兴趣不大。不过，在人类学的理论流派中，朱利安·斯图尔特 (Julian Steward) 的多线进化论 (multilinear evolution) 是个例外，该理论十分重视人口。他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化变迁，认为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而要了解各种文化如何运行，它们的相似之处与差异，“人类学家必须调查人口、工艺技术、社会组织 and 外部环境 (包括气候、地形、自然资源以及其他人群) 的相互关系”^②。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被视为衡量群体与其食源是否相适应的尺度，并认为这与社会政治一体化水平密切相关。

文化人类学中的人口文献可分为三类：1. 关于人口 (规模、密度和分布) 与政治及社会进化阶段的功能关系。这是些理论性的文章。其中有些研究提出了各种关系之间，如人口规模、人口压力与国家进化之间的广泛联系；其余的人则有更为专门的目标，例如，研究人口密度和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2. 以描述的

① Firth, Raymond. [1936] 1968. *We, the Tikopia: Kinship in Primitive Polynesia*. 3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② Fred Plog & Daniel G. Bates. 1976.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 New York: A. A. Knopf, Inc.

方式重建美洲土著与欧洲人接触初期的人口状况（规模、密度和分布）。3. 研究特定群体的人口结构。主要是分析现代人群，但也有少数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过去某一时点的人口。^①

在推动人口与文化进化的研究上，有两个人最为著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另一个是经济学家巴斯拉（Ester Boserup）。巴氏提出按劳动力平均的生产收益是经济行为的决定因素，即“最小努力法则”（law of minimal effort）。这说明在未有新的技术发明之前，粗放农业的效率比集约农业要高。但考虑到技术发明，集约农业则要效率高些，特别是水稻农业。^②

在人口与社会进化的相互关系上争论颇多。一种解释是，人口密度增长产生了对基本资源的压力，结果便是竞争和斗争，最终便形成彻底的政治一体化，更富于权威力量的制度以及经济的专门化。时常对这一模式加上环境的影响，因为这常导致不均匀的人口分布，从而在稠密地区形成未来的大国中心。但从模式中可以看出，不是人口密度本身，而是资源竞争引起了这些变化。密度仅是这种压力的粗糙度量。

卡内罗（Carneiro）又给这一模式添上另一重要因素——限定环境和开放环境的区别。这意味着对环境的二元类型划分，而实际存在的环境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连续过渡。^③这个概念与巴氏的理论有关。他认为在大部分环境中，粗放农业比集约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少。这意味着人们在未达到一定农业水平之前，总是倾向于开垦新的土地，于是人口密度不会显著上升。当自然环境将大块区域分成小块，农业得到加强，人口便会很快上升。这有助

① Baker, P. t. & Sanders, W. T. 1972. Demographic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1: 152.

② Boserup, E.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Chicago: Aldine.

③ 16 Carneiro, R. L. 1970.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69: 733 -